

《共产党宣言》的价值逻辑及其在当代中国的体现

邓斌 苏伟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桥梁”，真正联结起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实现了科学的方法论与价值论、事实逻辑与价值逻辑的高度统一。《共产党宣言》的价值逻辑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的历史的、辩证的价值否定，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的、热情的价值肯定，对共产党的领导的价值肯定，对科学社会主义普遍真理的价值肯定，对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的价值肯定等，既阐明了上述问题的真理性，又阐明了上述肯定项的正义性，闪耀着马克思主义高度统一的真、善、美的光芒。《共产党宣言》的价值逻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得到了多方面的体现，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旺盛的生命力，也显示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理性与道德性的高度统一。

【关键词】马克思 《共产党宣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者简介：邓斌（1969-），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 401120）；苏伟（1954-），西南政法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教授（重庆 401120）。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①这既是一个科学命题，又是一个价值命题，体现着事实逻辑与价值逻辑的高度统一^②。历史发展是客观规律性与主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自觉的历史主体是怎样创造历史的呢？显然，他们既是根据对历史趋势尤其是历史规律的认识与掌握，即根据事实逻辑，又是根据对自身利益尤其是价值目标的认识与设定，即根据价值逻辑，来进行实践、来创造历史的。《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价值逻辑，其理论意义、历史意义和实践意义都是极其巨大的，并且，也鲜明地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中，值得深入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事实逻辑与价值逻辑的辩证统一

本文所谓的价值逻辑，是与“事实逻辑”——以分清真假为前提并揭示事实发展规律的逻辑——相区别，并与之对应的一种逻辑，即以分清善恶、分清利害为前提，并明确主体对对象、对自身、对自身行为等进行价值肯定或否定的逻辑。

^①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② “价值逻辑”是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哲学和逻辑命题不是表示对象之间的相互归属关系，而是表示主体对于对象的态度，即评价。去除其否认哲学和逻辑命题不是表示对象之间的相互归属关系的唯心主义成分，与事实真理相表里的价值真理的内在逻辑，是马克思主义承认并看重的，并且是贯穿其理论体系中一条重要的“红线”。

价值逻辑当然要以事实逻辑为依据，并且事实上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不能截然分开。但由于事实逻辑是以客观世界中“事物的本来面目”为基础，而价值逻辑则是以主观世界中“人的尺度”为基础的，所以，二者又有重大的区别。如果说，事实逻辑更加着眼于包含着偶然性但又高于偶然性的“必然性”的话，那么，价值逻辑则更加着眼于包含着必然性但又“高”于必然性的“正义性”。价值逻辑的特殊意义在于：第一，它能使主体明确价值评价的标准，并对对象进行价值评判，以彰显善恶、美丑、正义非正义和利害关系等；第二，它能使主体将善恶、美丑、正义非正义等评判与利害评判统一起来，对主体的实践目标进行价值定位，以惩恶扬善、趋利避害；第三，它能使主体在善恶关系与利害关系相统一的基础上，对其实践目标和实现实践目标所必须具有的权力、权利、利益、实践方案、实践策略等进行价值评判，以彰显其正义性或非正义性。

尽管事实逻辑与价值逻辑有着内在的统一性，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达到二者的自觉统一之前，中国与西方的传统思维，都或者只是达到了事实逻辑与价值逻辑的自发联结，或者（更多的是）在二者的区别面前束手无策，只得顺势将其割裂^①。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的存在方式、主客体的联系方式、同时也是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的联系方式——实践——出发，去认识世界、认识人自身、认识主客体的关系，从而实现了哲学的革命，创建了一种新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而不但实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与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高度统一，而且以它为基础，实现了科学的方法论与价值论的高度统一，实现了事实逻辑与价值逻辑的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和代表作《共产党宣言》，不但鲜明地体现着事实逻辑与价值逻辑的辩证统一，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整套价值逻辑的首次系统展现，值得我们永远珍视。

二、《共产党宣言》的价值逻辑

《宣言》鲜明地体现了无产阶级的立场，用一整套全新的、闪耀着事实真理与价值真理辩证统一的理论观点，重新评价了人类的全部历史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不但揭示了资本主义一定要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客观必然性，而且揭示了社会主义必须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正当性，昭示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昭示出社会主义的正义性。

1. 《宣言》历史地、辩证地否定资本主义的价值逻辑

由于“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②，所以，资本主义从诞生之时起，就受到了持续不断的批判和否定。然而，前人的所有批判，都可归结为单纯的道德批判。与其根本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从历史性评价与道德性评价的统一上，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最为科学、最为彻底的批判和否定。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③但是，《宣言》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却是以肯定资产阶级曾有过的革命性为开端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④。而且，《宣言》的这种肯定还不是抽象的，而是

① 例如，休谟提出的“休谟问题”的重要内容，就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有本质区别，不能直接从表明“是”或“不是”的事实判断，推出表明“应该”或“不应该”的价值判断；例如，康德从其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得出的结论——“求真”的“纯粹理性”与“求善”的“实践理性”二者本身无法直接沟通，只能靠“求美”的“判断力”来间接地沟通；等等。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36页。

具体的、全方位的，“新兴的资产阶级……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并用“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大大增加起来的城市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它打破了封建割据，使西方各民族成为政府、法律、关税等都得到统一的“统一的民族”；它还打破了美洲和东方世界的封闭状态，“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①。总之，正如恩格斯所言：“《宣言》十分公正地评价了资本主义在先前所起过的革命作用。”^②

上述肯定是《宣言》关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价值逻辑的第一个环节。更为重要的第二个环节，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而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方方面面的革命性、进步性、合理性等向对立面转化的必然性的深刻揭示：“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魔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魔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③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向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转变，决定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革命性、进步性、合理性向反动性、落后性、不合理性的转变。而这些具有必然性的转变，就给《宣言》否定资本主义的价值逻辑的第三个环节，直接奠定了基础。《宣言》否定资本主义的价值逻辑的第三个环节，即结论性的环节，集中从三个方面展现了资本主义的反动性、落后性和不合理性。

第一，是从对生产力的限制和破坏上，揭示了资本主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反动性、落后性和不合理性。“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而资产阶级只能用“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④。第二，是从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上，揭示了资本主义非人道的反动性和不合理性。工人成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的“一种商品”，“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⑤。而且，“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⑥。这“活动着的个人”既包括工人，也包括资本家。也就是说，甚至于剥削、压迫工人的资本家自己，以及被资本所笼罩的所有个人，必然地被资本所异化。第三，是从价值观和伦理上，揭示了资本主义非道德的反动性、落后性和不合理性。资本主义制度“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并且越是这样，“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⑦。

诚然，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深刻地揭示过资本家对劳工大众无情压榨和资本主义商业投机、欺诈经营等唯利是图的罪恶，有的甚至看到了这一切罪恶的根源——私有制，但是，由于他们只是从道德层面去进行批判，因此，其价值逻辑尽管高尚，但未必有力。而《宣言》则将道德的批判与历史的批判统一起来，即将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和对工人阶级的压榨，与其对生产力的阻碍和破坏统一起来，将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危机与其经济危机统一起来。

2. 《宣言》科学地、热情地肯定社会主义的价值逻辑

《宣言》肯定社会主义的价值逻辑，是以肯定社会主义的创造者和主体力量——无产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的历史进步性为起点的：“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① 而这一肯定，也就同时将肯定社会主义的价值逻辑的基础，放到了社会化生产力这个雄厚的物质基础上，放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历史规律的基础上，体现着《宣言》固有的价值逻辑与事实逻辑的辩证统一。

《宣言》肯定社会主义的价值逻辑的重要一环，是从否定旧社会的核心要素中，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要素——“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建立能够“取得社会生产力”的占有方式，即公有制。为什么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呢？《宣言》讲到，其一，是“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其二，是因为“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②，社会主义要消灭阶级对立、消灭剥削，所以要消灭其基础——私有制。《宣言》明确地讲，正是从上述第二个原因“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③。由此可见，《宣言》所设定的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价值目标是两位一体的，一方面是“取得社会生产力”、更好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是消灭阶级对立、消灭剥削。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宣言》肯定社会主义的价值逻辑的核心环节，是“两个绝大多数”：“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④ 如果说，“是绝大多数人的”这个概括，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显示了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大联合的价值，《宣言》最著名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价值的话，那么，“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概括，则体现了社会主义运动者、尤其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显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⑤，《宣言》这个极其重要的观点，也是在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对比中论述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⑥ 我们知道，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即“死劳动”，从其实物形式看，就是社会的生产资料，亦即生产力中“物”的要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主要的生产资料都掌握在资本家手中，成为资本中的不变资本。而资本的实质，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所以，“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价值，就只能是成为价值增值的手段。这样，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价值增值，就被科学地揭示出来。与之相反，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即生产资料，主要都掌握在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个人手中，成为不断扩大同样为这些劳动者个人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物质手段。所以，这些“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价值，就变成了“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也这样被科学地揭示出来。

《宣言》肯定社会主义的价值逻辑，是以肯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归宿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⑦ 如果说，《宣言》里那句“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4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独立性和个性”^①的名言，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最深刻的本质特征——每个人（包括工人也包括资本家本身）实际上都是资本的奴隶，资本增殖才是其终极价值和最高目标的话，那么，《宣言》这一句名言，则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最深刻的本质特征，揭示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终极价值和最高目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这一目的比较起来，包括建立公有制并不断改革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包括按劳分配乃至按需分配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等，都是手段。正因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价值定位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言也是至高无上的，所以，我们都知道，恩格斯晚年应约用“题词”来概括其理想社会的时代精神时，就只列举了这段名言，并认为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②。

3. 《宣言》科学地肯定社会主义运动必须由共产党领导的价值逻辑

科学社会主义运动要由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必然性，这从《宣言》自身、从它的诞生就可得到一些说明——无产阶级的运动需要《宣言》这个“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③。无产阶级运动客观需要共产党的领导，这只是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必然性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共产党能够满足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基本要求，这又为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必然性提供了充分条件。共产党能够满足无产阶级运动的哪些最基本要求呢？《宣言》概括了两个，并作了以下回答。

其一，要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④。“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需要有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方面，在思想上，要使处于感性认识状态的无产者群众觉悟起来，具备理性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另一方面，在组织上，要使处于松散状态的无产者群众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步调一致、坚强有力的战斗集体。然而，这两个方面的条件，无产阶级群众自己却并不能提供，而需要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提供。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提供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使无产阶级从自发状态转向自觉状态，即“形成阶级”。

其二，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⑤。“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极其伟大的政治革命。而任何政治运动，尤其是政治革命，要想成功，也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利益上，要使无产阶级的利益得到整合，从而“形成”其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并使其利益尤其是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在革命的路线、纲领、政策中“被代表”、被表现出来。这样，无产阶级就会自觉地为自己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而奋斗。另一方面，是策略上，要使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符合革命的规律、符合革命的实际，尤其是革命中各种力量的对比情况。同样地，这两个方面的条件，无产阶级群众自己也并不能提供，而需要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提供。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提供政治条件，使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取得成功。

为什么共产党能够满足无产阶级运动的上述要求，提供无产阶级运动必须的思想条件、组织条件和政治条件呢？《宣言》作了以下回答。

其一，从性质上说，正如《宣言》指出的那样，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⑥。这种先进性，就不但显示了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必然性，而且从总体上、根本上显示了共产党领导的正当性、合理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其二，从思想上说，正如《宣言》指出的那样：“在理论方面，他们（指共产党人——引者注）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①因此，共产党才能提出以《宣言》为代表的，揭示出现代社会运动规律和无产阶级运动规律的先进理论，使无产阶级能够觉悟起来，从自发的状态转向自觉的状态，来进行无产阶级运动。这种思想上的先进性，既显示了共产党的思想领导的必要性、必然性，也显示了共产党的思想领导的正当性、合理性。

其三，从组织上说，马克思恩格斯在撰写《宣言》的同时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党章（即《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就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一些基本原则，确立了共产党组织上的先进性。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继《宣言》之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指出的那样，同盟“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成为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协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②。无产阶级接受共产党的组织领导的必要性，在这里被讲得再清楚不过了。共产党组织上的先进性，既显示了共产党的组织领导的必要性、必然性，也显示了共产党的组织领导的正当性、合理性。

其四，从政治上说，仍如《宣言》指出的那样，“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再加上如前所述的，共产党人在理论方面“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因此，共产党能够提出像《宣言》这样的“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从而，使共产党人既能“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又能“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③。而如果没有这个政治条件，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共产党政治上的先进性，既显示了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必要性、必然性，也显示了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正当性、合理性。

4. 《宣言》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的价值逻辑

《宣言》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问题的价值逻辑，至少有两个方面的价值肯定、两个方面的价值否定，意义都非常重大。

一个方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价值肯定，对反科学、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的两个极重要的序言中一再强调：“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④《宣言》阐述的一般原理，是在揭示整个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揭示无产阶级运动规律的基础上，“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⑤的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它既是揭示了客观规律的科学真理，又是体现和代表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价值真理。因此，在整个资本主义时代，在整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时代，《宣言》阐述的一般原理，都会既闪耀其真理的光芒，又闪耀其道德的光芒。今天，我们将“25年来”换成“170年来”，马克思恩格斯肯定《宣言》一般原理的结论，仍然是完全成立的。这个肯定，也就是对无产阶级运动、社会主义建设、共产党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正当性、合理性的肯定。

《宣言》在对其一般原理进行充分肯定的同时，还对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6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43页。

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等“反动的社会主义”，对“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对“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思潮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与批判，不但揭示出它们各自的思想实质、谬误之处，而且揭示出它们的阶级基础，尤其是揭露出它们对无产阶级运动的危害。因此，这些分析与批判，既是对它们的科学性的否定，也是对它们的价值性的否定。

《宣言》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肯定与对反科学、非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价值否定，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价值论启示：一定还要从维护无产阶级运动的根本利益的价值认识上，来增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自觉性；一定还要从各种思潮的阶级属性上，尤其是从它们对无产阶级运动的利害关系上，对它们进行分析、辨别，以增强否定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自觉性。

另一个方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与实际相结合和理论发展的价值肯定，对教条主义倾向的价值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的两个极重要的序言中还一再强调：《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①。《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个“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其阐述的一般原理，在充分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阶级性特点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其实践性特点。实践，首先具有主体性。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主体，是工人阶级。《宣言》强调：“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②这个论断，既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直接的价值指向——工人阶级，也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主要的价值所在——被工人阶级“实际运用”。也就是说，按照《宣言》的价值逻辑，对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的价值，高于其单纯的理论形态存在的价值。在《宣言》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对此就有明确的论述：“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③在《宣言》之后，马克思对此有更明确的表述：“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④列宁也特别强调这个价值定位的重大意义^⑤。

实践，还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历史性，会随着实践主体和实践条件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工人阶级自己，就会随着社会化生产力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壮大，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各个国家的民族的、自然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更会使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历史条件有所不同，甚至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就应当在发展着的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不断得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的几篇序言中，反复地指出了这一点。这些论述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高于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社会主义一般原理的价值高于社会主义具体结论的价值、发展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高于固守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

今天，我们彰显《宣言》上述两个方面的价值肯定和否定，就可以更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实际运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更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更自觉地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更自觉地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6页。

⑤ 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60页。

三、《宣言》的价值逻辑在中国新时代的鲜明体现

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鲜明地体现出事实逻辑与价值逻辑高度统一的特征。从毛泽东“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①的历史性结论，到邓小平“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②的新的历史性结论，都既有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真理性、必然性的肯定，又有对它的价值性、应然性的肯定。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地既鲜明地体现了以《宣言》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事实逻辑，又鲜明地体现了其价值逻辑。

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四个自信”的价值肯定，体现了《宣言》否定资本主义、肯定社会主义的价值逻辑。习近平在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后不久就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③这一重要判断，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典范。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反复强调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问题，并最终形成“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要求。这一要求，既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一事实判断基础之上，也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这一价值判断基础上的^④。此外，习近平还对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的价值逻辑添加了方法论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⑤在此理论基础上，习近平代表我们党一再重申的政治结论：“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更加有力、更加合理。这都是对《宣言》否定资本主义、肯定社会主义的价值逻辑的历史性延续和生动体现。

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梦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肯定，体现了《宣言》肯定“两个绝大多数”的价值逻辑。中国梦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价值意蕴极强的概念：“中国梦意味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体认和价值追求，意味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在为中国梦的奋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意味着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意味着中华民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真诚意愿。”^⑥体认，是主体在亲身体验中的认识；追求，是主体在目标明确的实践中的自觉行动。价值体认，是主体形成责任担当的重要前提；价值追求，是主体实现价值目标的必经过程。中国梦这一价值体认，就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对自己切身利益尤其是根本利益的体验中获得的深刻认识，同时也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形成的利益多元化格局中提升的“最大公约数”；中国梦这一价值追求，就是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的自觉行动，而这一群体主体的行动同时也包含着每一个中国人为实现自己的个人梦想的自觉行动。由此可见，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正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自觉参与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2页。

④ 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9页。

⑤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页。

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1页。

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中国人谋取利益的运动。这个客观现实，正是党的主观性要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重要基础。

要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群众史观”，体现了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上的根本态度，其价值意义极其巨大。由此可见，中国梦的执政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方略，是对《宣言》肯定“两个绝大多数”的价值逻辑的历史性延续和生动体现，同时也是对《宣言》肯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价值逻辑的历史性延续和生动体现。

第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体现了《宣言》肯定社会主义所有制变革的价值逻辑。众所周知，《宣言》有一句名言：“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然而，《宣言》的这个结论，是建立在其整个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尤其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与状况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因此，对于这一原理的“实际运用”，也“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尤其是生产力性质与状况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为转移。遵循《宣言》的这一方法论原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纠正了以前想迅即消灭一切私有制的错误做法，确立并坚持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十八大以来反复重申的基础上，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② 值得重视的是，习近平在我们党既有认识的基础上，对“两个毫不动摇”所指向的两个对象的价值内涵作出了新的论述：“在功能定位上，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③ 并且，还对其分别作出了新的论述。就公有制经济而言，习近平指出：“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为国家建设、国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作出了突出贡献，是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当然要让它发展好，继续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这既是一个事实描述，同时也是一个价值论断，既讲明白了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必然性，又讲明白了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合理性。就非公有制经济而言，习近平指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是在我们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指引下实现的。长期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④ 这又既是一个事实描述，同时也是一个价值论断，既讲明白了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又讲明白了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合理性。在这样的基础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两个毫不动摇”的价值意义，也就有了新的推进：“在产权保护上，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⑤ 由此可见，“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既已经在我国所有制结构的

①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79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59、260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79页。

“主体”中体现了《宣言》“消灭私有制”的原则，又在总体上发展了包含着这一原则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体现了《宣言》肯定社会主义所有制变革的价值逻辑。

第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最”的论断，体现了《宣言》肯定共产党领导的价值逻辑。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①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过的这“两个最”的精辟论断，也体现着事实逻辑与价值逻辑的统一。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后来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定为共同理想的伟大政党，把中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自己周围，领导人民开创出来、建设起来的。因此，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最根本的内在统一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②习近平要求，对我国宪法确立的“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一点，要理直气壮讲、大张旗鼓讲”^③。如前所述，《宣言》对共产党领导的价值肯定，主要是从社会主义“运动”与共产党的关系角度讲的，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但从这个关系，而且进一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共产党的关系角度，对党的领导进行了价值肯定。由此可见，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最”的论断，是对《宣言》肯定共产党领导的价值逻辑的历史性延续和生动体现。

第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两个逻辑辩证统一”的新判断，体现了《宣言》肯定理论结合实际的价值逻辑。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了理论结合实际这一《宣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问题，并特别要求：“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④这都体现了《宣言》肯定“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的价值逻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不但反复强调了理论结合实际这一方法论的意义，而且还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方法论本身的理论内容，提出了“两个逻辑辩证统一”的方法论新思想。“两个逻辑辩证统一”，是习近平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首要问题”的一个新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⑤很明显，这是对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说是继承，这很清楚；说有发展，就得加以说明。首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⑦的“理论本体”，都是卷帙浩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尽管马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页。

②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页。

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47页。

④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人民日报》2015年1月25日。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1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⑦ 科学社会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含义，泛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狭义的含义则专指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理论与实践问题作过一些概括，但并未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或“社会主义普遍原则”作出整体性概括。然而，实践又需要后来者作出整体性概括，以指导具体实践。这个概括过程既是应用、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良机，同时也蕴涵着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社会主义普遍原则不同程度地片面化、孤立化、静止化的风险。正是在总结吸取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之后，习近平才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这一概念，它不但指向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而且指向其各个基本观点、基本原则之间必然的内在联系。因此，它指向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社会主义普遍原则的整体。同理，“我国的具体实际”的“实在本体”，是中国全部的客观现实。为了“相结合”，就需要我们将其主要内容和主要特点概括出来。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可能出现主观化、片面化、静止化的问题，例如，将阶级矛盾概括为社会主要矛盾等。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则进了一步，它不但指向中国的具体实际，而且指向其各个主要内容、主要特点之间必然的内在联系。因此，它指向的，是我国具体实际的整体。可以说，“两个逻辑辩证统一”的新判断，确实发展了“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这一重大发展，不但增强了《宣言》开创的理论联系实际方法论的真理性，而且提升了这一方法论的价值性；不但重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各个要点，而且重视各个要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整体把握“普遍真理”；不但重视“具体实际”的主要内容与特点，而且重视其内在联系，以整体性把握“具体实际”。坚持不懈地推进“两个逻辑辩证统一”，将使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得到新的发展，使以《宣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闪耀出更加夺目的、事实逻辑与价值逻辑交相辉映的光芒。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 [2] 杨振闻：《〈共产党宣言〉中的价值哲学》，《求索》2018年第5期。
- [3] 靳辉明：《〈共产党宣言〉的理论价值及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年第1期。
- [4] 严书翰：《〈共产党宣言〉的精神真谛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基因——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和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2期。
- [5] 谭玉敏、梅荣政：《“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理论源头——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红旗文稿》2018年第4期。
- [6] 冯茜：《马克思主义经典时代价值的新探索——读黄明理〈共产党宣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 [7] 吴日明：《〈共产党宣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编辑：张 剑）